



狼土兵与嘉靖御倭王江泾大捷述论

胡 凡,朱皓轩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嘉靖时期,倭患猖獗;“庚戌之变”后,明廷接受主持东南抗倭事宜张经之建议,调用广西狼兵及湖广土司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在这背景下,狼土兵雄赳赳地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抗倭战争。御倭过程中,他们多次立下战功,使疲于奔命的明军得到喘息,为驱除倭患献出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本文以著名的王江泾大捷为例,通过起用张经、调拨狼土兵、王江泾大捷以及评述狼土兵之影响四个部分,来尝试叙述狼土兵在东南抗倭战场上建立起的丰功战绩。

关键词: 嘉靖御倭;狼土兵;王江泾大捷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6—0073—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6.018

Tusi Soldiers and the Victory of Wang Jiangjing Battle in Jiajing Time

HU Fan, ZHU Hao-xuan

(Center of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Civilization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Jiajing time, the terrible situation made by the Japanese pirates got worse and worse. After Gengxu Event, Ming government tried best to stop the force from Mongolia and they had no enough power to resist foreign aggression from Japan, so it had to be accepted by the emperor that the government transferred the Tusi soldiers to take part in the war, which was suggested by Zhang Jing who is undertaking the matters about pirates in southeast of China. In this situation, Tusi soldiers actively participated the war for protecting the nation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ing government. This paper is composed by four parts, including appointing Zhang jing, assigning Tusi soldiers, the victory of Wangjiangjing Battle and the impact of Tusi soldiers on the battle. The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established by Tusi soldiers with the example of Wangjiangjing Battle.

Key words: the war rebelling Japanese pirates Jia-jing period; Tusi soldiers; the victory of Wangjiangjing Battle

明代嘉靖时期,倭患逐渐猖獗起来,明王朝不得不采取行动,嘉靖年间御倭战争就此展开。狼土兵战斗力强,是此时期一支重要的抗倭武装,但是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太大注意。近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部分学者已把目光投集于此。韦天富的《论广西狼兵在明代沿海抗倭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5期),从整体上对狼土兵在抗倭战争中的过程以及影响作了一番综述。李良品的《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领导体制研究》(《贵

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论乌江流域“土司兵”的成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蓝武的《明代广西壮族土司土兵“供征调”及其社会影响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唐晓涛的《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等都是研究狼土兵的专论。但是,学者们大多都是从狼土兵自身的起源、制度以及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尚未发现有对抗倭中的狼土兵的相关内容做过专题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2;修回日期:2015—12—21

作者简介:胡凡,男,吉林东丰人,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中国文化史和文化学理论。

参加抗倭战争的狼土兵主要是以广西“狼兵”和湖广土司兵为主。狼土兵们最显耀的战绩就是王江泾大捷。对于王江泾大捷,台湾学者郑樑生先生的《张经与王江泾之役——明嘉靖间之剿倭战事研究》(《汉学研究》第10卷第2期,1992年12月)曾给以深入研究,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但他多是从抗倭战争本身的角度来解读,而本文则拟从狼土兵参加抗倭战争对取得王江泾大捷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一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张经主持抗倭战事

王江泾战役发生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年间,由于倭患严重而首任被派往东南主持御倭的官员是朱纨。嘉靖二十六年七月,“改巡抚南赣汀漳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1]卷325,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丁巳条}。朱纨到任后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但得罪了沿海不少与倭寇勾结的商人,于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由“巡抚”降为“巡视”;二十八年四月,被罢职;二十九年,朱纨于家中自杀。另一位主持抗倭的大臣是王忬,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帝“命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2]卷204,王忬传},不久后又命王忬巡抚大同,将其调离抗倭前线。

接着主持抗倭战事并取得王江泾大捷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在明军与倭寇多次战争落败后,嘉靖帝起用了张经,“朝议以倭寇猖獗,设总督大臣。命经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经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办讨贼”^{[2]卷205,张经传}。

在张经主政抗倭事宜前后,明廷面临的御倭战况是非常严峻的。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倭寇于浙江“纵火焚城楼及民房数百间而去”;癸丑,倭寇又侵入上海县,“知县喻显科逃匿,指挥武尚文及县丞宋鳌俱战死。贼屯县中七日,纵火焚官民廨宇庐舍略尽”^{[1]卷398,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己酉条、癸丑条}。嘉靖三十三年二月,松江府官兵追击上海的倭寇,“县丞刘东阳死之”^{[1]卷407,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庚辰条}。三月,参将俞大猷督兵剿杀普陀山倭寇,“我军半登,贼突出乘之,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余人”^{[1]卷407,嘉靖三十三年三月癸丑条}。四月,处在浙江的倭寇进攻嘉兴,“参将卢镗等帅兵御之,稍却,次日,复战于孟宗堰,官军败绩,亡卒千人,都司周应桢、指挥李元律、千户薛綱、宋应澜等俱死之”^{[1]卷409,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条}。稍后,嘉兴县陷落,崇明县知县唐一岑战死。六月,倭寇“由吴江转掠嘉兴,署都指挥僉事夏光督兵御之,背王江泾而阵,贼众鼓噪而前,我兵大溃,光流矢

死”^{[1]卷411,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甲申条}。八月,山东兵追击倭寇,“至采淘港,乘胜深入。伏起,我兵大溃,溺水死者千人,指挥刘勇等死之”^{[1]卷413,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庚寅条}。十月癸未,“浙江续至倭寇万余人,分掠乐清、黄岩、东阳、永康等县”^{[1]卷415,嘉靖三十三年十月癸未条}。壬辰“倭寇三千余人,由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1]卷415,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壬辰条}。

据以上《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明廷连续失利是确实的。持续的败绩让主政抗倭事宜的张经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在采淘港之役大败之后,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御史张师价弹劾张经,认为采淘港之败应当“罪总督张经”^{[1]卷415,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壬申条}。兵科都给事中李用敬论劾总督南京兵部尚书张经纵贼误国四事:“其一,受命半载,一切军情利害不闻奏报;其二,山东兵至,不量客主劳佚之势,而轻于一战,为贼所掩;其三,兵败之后,不即席藁引罪而隐匿至二月余;其四,以坟墓在闽,恐为诸寇齟齬不敢尽力驱剿。”嘉靖把此奏折给吏部和兵部覆议,二部商讨后认为不是张经的过失。在此背景下嘉靖帝下令:“改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一总督军务,克期平贼,不许怠误。”^{[1]卷415,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条}可见,张经当时所承载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二、征调狼土兵到抗倭前线

征调狼土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上面所说的明军与倭寇战争败多胜少,需要任用战斗力相对较强的狼兵;二则与张经履历有关。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张经上奏请求任用白泫及广西都司都指挥邹继芳,并让他们“往田州、归顺、南丹、东兰、那地调狼兵五千人,各帅至浙直御倭”^{[1]卷412,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乙丑条}。而在张经被李用敬弹劾时,兵部、吏部认为,广西狼兵与湖广土司兵尚未入境是战局持续落败的主因之一。^{[1]卷415,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条}其实早在王忬巡视浙江时,就建议朝廷征调狼土兵抗倭。后来张经也向嘉靖帝建议起用狼土兵,并且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为什么张经会建议征调狼土兵呢?我们从张经的履历上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嘉靖十六年,张经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嘉靖十八年,在平定广西断藤峡战役中立下战功。^{[1]卷227,嘉靖十八年七月甲寅条}在嘉靖二十五年三月被调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之前^{[1]卷309,嘉靖二十五年三月丙子条},他都是在有土司地区任职,这次调动很快作罢^{[1]卷310,嘉靖二十五年四月乙未条},他依旧任职于广西。常年与土司打交道使张经对土司极为熟悉,“经故尝督两广著绩”^[3],由于他处理土司事务较为公正、公平,为

众土司们所信服,也获得朝廷的信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经调来了狼土兵参加抗倭战争。

在史料记载中“狼兵”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它属于土司兵中的一类。关于“狼兵”一词的出现,韦天富提出,“狼兵”是源于正德年间^[4]。但是在《明实录》中最早见“狼兵”一词的是《明英宗实录》正统二年冬十月戊午^[5]卷35,正统二年十月戊午条;在景泰元年三月^[5]卷190,景泰元年三月乙卯条、景泰四年六月^[5]卷230,景泰四年六月乙巳条、天顺二年八月^[5]卷294,天顺二年八月丙子条均有“狼兵记录”,因此“狼兵”一词最早出现于正德年间的说法不妥。

《明史·张经传》中,有参加王江泾大捷的狼兵记录,其中提到的狼土兵有“田州瓦氏”、“思恩”、“东兰”、“那地”、“南丹”、“归顺”、“永顺”、“保靖”等^[2]卷205,张经传。

田州,元为田州路;明洪武二年改为府;嘉靖七年降为州;今为广西省田东县。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七月,田州府土官岑伯颜等“遣使赍印章,诣平章杨璟降”^[6]卷32,洪武元年七月己巳条。洪武二年七月,岑伯颜又向明朝“遣使奉表,贡马及方物”,明廷则“诏以伯颜为田州府知府。”^[6]卷43,洪武二年七月丁未条。岑氏家族遂继续以土司的身份来管理田州,直到嘉靖时期。瓦氏,土官之女,岑猛之妻。在岑猛叛乱死后,继承其土司的儿子岑邦相又因为一系列斗争死于瓦氏之手^[1]卷196,嘉靖十六年正月乙巳条。这时,岑猛的孙子岑大寿、大禄都还年幼,瓦氏不得不接过田州土司的重任。朝廷征召田州土司抗倭,瓦氏就以女土司头目的身份赴沿海抗倭。

思恩,明初属田州府,土官为岑氏,洪武二十二年,“田州府知府岑坚遣其子思恩州知州永昌贡方物。”^[6]卷206,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条。正统三年正月,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从征蛮寇有功”,以其为田州府知府仍掌州事^[5]卷38,正统三年正月壬寅条;后升思恩为军民府^[2]卷318,广西土司二。

东兰州、那地州、南丹州,三州均属于广西庆远府。东兰州土官韦富挠于洪武十二年,“遣其家人韦钱保诣阙,上故元所授印,贡方物”^[6]卷170,洪武十二年正月辛巳条。明初,土司归附明廷,是必须得缴纳前代的信物、印章,然后接受明廷颁发的相关印章,这是政治上臣服于明廷的标志。韦氏家族在东兰州势力很深,因为“富挠之先,自唐、宋以来据有东兰二州”^[6]卷170,洪武十八年正月辛巳条。其势力之大,以至于在洪武十八年,韦富挠叛乱被广西都指挥使司发兵平息了以后,明廷还不得不继续任命韦氏家族的人继续管理东兰州^[2]卷317,广西土司一。那地州土官罗黄貌于洪武元年归附,“诏并那入地,为那地州,予

印,授黄貌世袭土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2]卷317,广西土司一。罗氏家族占据那地州最早也要追溯到宋熙宁年间。南丹州,明洪武初,安抚使莫天护归附,七年置州,授莫金知州。后来莫金叛乱被平息以后,改土归流;但是,由于“其地多瘴,迁之宾州。既而蛮民作乱”^[2]卷317,广西土司一。不得已,明廷复置土官知州,以莫金儿子莫禄为之。

归顺州,前为峒,隶属于广西镇安府,土官头目为岑氏。《明史》说归顺土官岑瑛“屡率兵报效”^[2]卷319,广西土司三。弘治时期,归顺由峒改为州,“增设流官吏目一员”^[2]卷319,广西土司三。归顺州最值得一说的土官是岑璋。岑璋是田州瓦氏的亲生父亲,也就是岑猛的岳父。岑猛叛乱时,岑璋是镇压其叛乱的关键人物,而且岑猛是被岑璋“鸩杀”并“斩其首”的^[2]卷319,广西土司三。

永顺,湖广土司,“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也。宋初为永顺州”^[2]卷310,湖广土司,“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2]卷310,湖广土司。洪武二年十一月己卯,永顺宣抚彭添保派遣其从兄彭敬保“来朝贡马及方物”,“诏以永顺宣抚司为永顺军民安抚司,以添保为同知”^[6]卷47,洪武二年十一月己卯条。天顺二年七月,调永顺宣慰司宣慰使彭世雄等土司会剿贵州东苗^[5]卷293,天顺二年七月己亥条。弘治十八年十二月,永顺宣慰使彭世麒因功进“昭毅将军仍赐敕褒之”^[7]卷8,弘治十八年十二月甲戌条。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甲戌,“命调永顺宣慰司彭明辅、保靖宣慰司彭荃臣,各帅所部土兵三千人前赴苏松”^[1]卷417,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条。

保靖,湖广土司,“唐溪州地,宋置保静州,元为保靖州安抚司”^[2]卷310,湖广土司。明末建立时,朱元璋便“以彭世雄为保靖军民安抚使”^[6]卷19,丙午春二月丁卯条。洪武元年九月,保靖安抚司安抚彭万里派遣其子彭德胜“奉表献马及方物”,而明廷则“诏以安抚司为保靖宣慰司,以万里为宣慰使”^[6]卷35,洪武元年九月辛酉条。景泰七年六月,因铜鼓、五开、黎平等处苗贼叛乱,明廷派遣保靖土兵协助平叛^[5]卷267,景泰七年六月癸丑条。嘉靖三十三年,宣慰司彭荃臣与永顺宣慰司一起率兵平倭^[1]卷417,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条。

通过对参加抗倭战争土司的分析我们发现以下几点:

1. 参与抗倭的土司大多管理本地时间长。大多可以前推到宋代甚至唐代,其统治本地时间往往数百年,这使得土司在本地有较大的势力,一旦他们叛乱,将造成非常大的祸害;相反,如果这些土司能够为国家所用,其彪悍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将得到释放。土司进入沿海抗倭,就是肩负起了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

2. 参与抗倭土司与明廷建立了比较固定的朝贡关系。明初,有大量土司向明廷归降,归降的土司除了缴纳前代所赐印章、信物外还得同明廷建立固定的朝贡关系。如,湖广永顺便是“每三年一入贡”^[2]卷310,湖广土司。朝贡意味着土司遵守明廷的管理,这是政治服从的表现,也是朝廷派遣这几个土司赴前线抗倭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

3. 参与抗倭土司大多有较多的战争历史,都有参与镇压叛乱的记录。如保靖协助镇压苗族叛乱,永顺镇压东苗,归顺镇压岑猛叛乱等。能够参与朝廷的镇压活动本身就证明了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同时由于常年处在战争之中,士兵久经战阵,能够保持强悍的战斗力的,也就有可能在战场上打败倭寇。

三、以狼土兵为主力的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镇,现属浙江省嘉兴市,位于江、浙交界处,向北可进入江苏苏州、无锡等富裕地带,往南又是浙江腹地,嘉靖年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在明代抗倭史上彪炳史册的“王江泾大捷”,同时也记录下了狼土兵的卓越战功。

对于各个土司头目所带领参加抗倭的人数,我们有必要做一下简单的梳理。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张经奏请白泫、邹继芳到“田州、归顺、南丹、东兰、那地调狼兵五千人”^[1]卷412,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乙丑条。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永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彦臣“各统土兵三千名及致仕宣慰彭明辅、官生彭守中等报效兵二千名俱至松江”^[1]卷42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癸未条。永顺、保靖各三千,报效兵二千(报效兵是自备武器、粮食的家丁或者士兵),那么总共就八千人。在后来的张经被抓至京城写给嘉靖帝的奏折里详细地描述了各个狼土兵的分配情况:

“今岁(嘉靖三十四)三月初,田州土官妇瓦氏及东兰等州官舍各兵继至,臣从宜分布,以瓦氏其配总兵俞大猷,屯金山卫,为捣巢西路;以东兰、那地、南丹三州兵配游击邹继芳,屯闵行行为捣巢北路;以归顺兵及募至思恩兵、广东东莞打手配参将汤克宽,屯乍浦为西路右哨,……相机战守。”^[1]卷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丁巳条

根据张经的奏折内容可以看出,其兵力布置还是比较清晰、合理的,三个方向都增加布置了狼土兵。实际上永顺、保靖两路狼土兵到达时间晚与田州等狼土兵,他们到的时间为当年四月,比田州瓦氏等晚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在保靖狼土兵刚到前线时便获得了一场不小的胜利,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子,占据三丈浦的倭寇分众掠常熟、江阴村镇,保靖千余狼土兵在与当地士兵的配合下“攻其巢,破之,斩首百五十级,烧贼舡二十七只余,贼奔江

阴”^[1]卷42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子条。这对于常常打败战的明军来说,是大快人心的;对于初至抗倭战场的狼土兵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局。然而同年二月,上“备倭七事”^[1]卷419,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条。随后奉旨至松江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赵文华却插手抗倭事宜,此时的赵文华已经攀附上首辅严嵩,以严嵩为义父。然而张经以自己的官阶高于赵文华,“不为意,(文华)心衔之”^[3]。实际上张经是有自己的战略布局的,“经欲候所徵永保兵并力,以文华佻妄,不敢漏师期”^[3]。除了这个原因外,张经在上疏给嘉靖帝时说得清楚:“远调之兵,新至之将,贼情地利皆所未谙。游击白泫以田州兵千余往探陆哨,遇贼伏,卒杀其头目钟富,损兵大半,则狼兵之不宜骤用,明矣。”^[1]卷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丁巳条。可以看出张经也是因为永顺、保靖两路狼土兵尚未到达而不敢贸然出兵,而且新到的狼兵不知敌情,同时也有轻敌的思想,考虑到这些因素,表现出张经比较高的战略战术素养和谨慎的作战风格,但不明内情而攀附奸臣严嵩的赵文华为此而怀恨在心。如同年四月早于保靖狼土兵初战之前,在狼兵稍有斩获后,赵文华感觉狼兵“果可用”,然后“厚犒之,激使进剿”;但是当狼兵到达漕泾后遇到倭寇,结果“数百人与战,不胜,头目钟富、黄维等十四人俱死,兵众死亡甚众”^[1]卷42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辛未条。这对于狼土兵和倭寇来说都有不小的影响,经过此战,“贼知狼兵不足畏,复肆掠如故矣”^[3]。在此之前,倭寇对于狼兵的威名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对待狼兵和狼土兵也是十分谨慎的,经此一败,虽然对于抗倭整体战局没有太大影响,可是狼土兵对于倭寇心理上的优势却有不小的损失,对因狼土兵刚至而安心的当地民众,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朔,柘林倭寇和新至倭寇共四千余人突犯嘉兴^[1]卷42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甲午条。柘林,今上海柘林镇。倭寇什么时候开始屯集在柘林笔者没有找到明确记载,有记载的是嘉靖三十三年,一股倭寇自嘉兴而来,聚集在柘林^[1]卷413,嘉靖三十三年八月癸未条,以此为巢,而且新来的倭寇往往与柘林聚合一起祸害周边。这些倭寇以柘林为驻扎中心,祸害四周,当地百姓苦之久矣。

面对着新聚集即将来犯的四千余倭寇,张经已经做了充分的军事布局,“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趋平望,以克宽引舟师由中路击之”^[2]卷205,张经传。在做好这些布局以后,众将士们等待着倭寇的到来。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明实录》是这样记载的:

“总督[强](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粮](狼)

土等兵水陆击之。保靖宣慰使彭荃臣与贼遇于石塘湾大战,败之。贼遂北走,平望副总兵俞大猷,以永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击之,贼奔回王江泾,保靖兵复[击急其后](急击其后),贼之大溃。诸军共擒斩首功凡一千九百八十人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众。余贼不及数百,奔归柘林。”^{[1]卷422,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条}

从该段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此次战役总共可以分成三次:第一战,以参将卢镗督军,主力部队是湖广保靖宣慰使彭荃臣率领的狼土兵,他们在石塘湾遭遇击败倭寇。其实,在此战之前彭荃臣在同年已经与倭寇在此地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彭荃臣率军刚到此地,士气正旺,想“乘锐直前”^[8]。时任巡按御史的胡宗宪派人告诉彭荃臣“贼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尝为所诱,宜分奇正左右翼击之”^[8]。在抗倭战场上,后来主持东南抗倭的胡宗宪还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他总结了倭寇惯用的作战方式“善伏”,但是,初来的彭荃臣不听,结果在石塘湾中了倭寇的埋伏。败后,胡宗宪亲自跟彭荃臣分析“汝宜分道而伏,贼至,前锋迎敌佯败走,俟其过伏,盖起夹击,蔑不胜矣”^[8]。胡宗宪建议他采取佯败而埋伏围攻倭寇的办法,结果,这次保靖狼土兵一雪前耻击败了倭寇。第二战,倭寇向北逃跑到平望,此时平望副总兵为抗倭名将俞大猷,永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奉命率兵迎战,倭寇不敌,再次逃窜。第三战,倭寇在平望战败后败退至王江泾,“适值总督张经从松江兼程而来,又永顺宣慰彭翼南复从泖湖西来”^{[9]卷34},所有到达的狼土兵一起攻击倭寇,倭寇不能敌,几百人得以逃脱,战后清点杀敌战果,共斩首一千九百八十级,溺水及走死者甚众。这就是王江泾大捷的整个过程。

《明实录》称王江泾大捷为“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切](功)云”^{[1]卷422,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条}。《明史》称之为“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2]卷205,张经传}。王江泾大捷无疑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自此之后,方知贼甚可杀,人人有斗志矣”^{[9]卷34}。这次战役的主力是当之无愧的狼土兵,以上分析所说的组成王江泾三次战役的参与者均是以狼土兵为主,这是狼土兵参与抗倭战争获胜的一次影响极大的典型战役。

四、狼土兵参战的影响

王江泾大捷以后满朝皆喜,然而赵文华抢先于张经一步上奏嘉靖帝,功劳被赵文华、胡宗宪独占,而张经则“为赵文华所诬构”^{[1]卷427,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庚寅条}。嘉靖三十四年十月,立下战功的张经与浙江都御史李天宠、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一起被杀于

市”^{[1]卷427,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庚寅条},”天下冤之”^{[2]卷205,张经传}。

虽然张经被杀,但是狼土兵们却获得了嘉靖帝的褒奖。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在田州瓦氏刚带领狼兵至苏州时,明廷就“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各银二十两、纁丝二表里,余令军门奖赏”^{[1]卷42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辰条}。次年五月王江泾大捷以后,“巡按浙江御史赵孔昭上王江泾平倭功次”^{[1]卷435,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戊午条},进“保靖宣慰使彭荃臣、永顺宣慰应袭官舍彭翼南阶俱昭毅将军”^{[1]卷435,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戊午条}。对于土司来说,能够获得明廷封赏“昭毅将军”称号,说明朝廷肯定了他们的赫赫战功。

明代嘉靖时期狼土兵参与抗击倭寇战争,从当时的战局来说,对于败多胜少的明军是有力的补充,他们是输入腐朽明廷军队的新鲜血液,狼土兵参与战争后明军整体战斗力明显得以提升,抗倭战局由此也得以改观。从民族交流的角度来说,狼土兵们奔赴抗倭一线,由于抗倭主战场是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这些省份又是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而狼土兵们大多生活在广西、贵州、湖广等省份的比较偏远的山区之中,这些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活很闭塞,平时与汉族交流的机会比较少,在历代统治者看来这些地区都属于“化外”。狼土兵参加抗倭战争就有接触到区别于广西、湖广等地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机会,民族之间得到交流,在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明朝,这样的交流机会还是比较难得的。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归属感增强的表现。长久以来,不管是唐宋的羁縻政策还是元代以后的土司制度,都是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的手段,中原地区视其为“化外”,他们也有自己的“土皇帝”,分割状态较为明显,各自为政,现在在外敌入侵国家时,狼土兵能够参与反侵略战争,

在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与增强。从另一方面来说,狼土兵长久以来都是地方部队,是土司们自己的武装,狼土兵们服从于土官的调配,对于国家稳定来说也是一种威胁。现在,中央政府通过命令土官的形式,使土官率领手下所拥有的狼土兵参与平叛和抗倭,实现了把长期分离的地方部队纳入到国家的军事序列当中,使当时的中央政权在遇到问题而需要军队时多了一种选择,这是明廷对整个国家统治力增强的表现。

但是,我们在看到狼土兵参加抗倭战争有贡献的一面时,也得注意到当时狼土兵带来的负面影响。

(下转第105页)

台,也和于谦的处理不当有很大关系。

故而《明实录》评于谦“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视勋旧国戚若婴稚,士类无当其意者,是以事机阴发,卒得奇祸”^[5],可谓一针见血。

四、二人被杀的最后机缘——可悲的牺牲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造成岳飞、于谦两出悲剧的根源极为相似,就连促使统治者最后下决心杀死二人的契机也颇为类同。

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再次得知与金国议和的可能性,金人的条件是杀岳飞。(当时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提出:“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1])以杀岳飞换取对金议和,他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甚至可说是正中下怀的。

而景泰八年正月南宫复辟后,明英宗下令都御史萧惟贞负责审理于谦的案子,惟贞坐以谋逆罪,处极刑。奏上,英宗还有些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然而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

变)为无名”^[4],意思是由于谦来承担这次政变的责任。他们诬陷于谦与黄竑等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说这样才逼得太上皇复出收拾局面,这就为政变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和理由。如此一来,英宗的心意遂决。

于是,两位擎天立柱式的英雄就这样沦为某种政治需要的可悲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 [1]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明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
- [6] 谈迁. 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 李兆平]

(上接第 77 页)

由于他们来自偏远地区,所以狼土兵们的汉化程度都不高,导致他们把本地区形成的恶习带到沿海地区,比如抢劫百姓、滥杀无辜等现象就时有发生。对于调动狼土兵朝中争议一向都很大,如王守仁就说过“狼兵所过,不减于盗。”^[10]卷9,别录一,奏疏一 在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兵,自浙江平寇还,骄甚,无复纪律,所过肆掠,民缘江上下多被焚劫者”^[1]卷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御史屠仲律听说了以后要求严惩土官彭荃臣、彭翼南,兵部复议后认为他们刚立下战功,不适合惩戒,“恐孤远人效劳之意”^[1]卷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不得已只惩罚了带头作乱的小头目,同时规定“今后浙直督抚官各遵前旨,团练乡兵御贼,不得轻调客兵”^[1]卷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由此看出,明朝统治者对狼土兵的使用还是比较谨慎的。

此外,张经的突然被杀,是狼土兵祸害百姓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张经熟悉狼土兵的优缺点,能够把狼土兵放在合适的战略位置,而且狼土兵也是比较信服张经的。张经一死,狼土兵在某些时候便失

去了控制力,其缺点也就显现出来。尽管如此,狼土兵在抗倭史上的影响还是利大于弊,其历史功绩是不容质疑的。

[参考文献]

- [1] 明世宗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2]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董应举. 崇相集选录(附录一)[M]. 日本.
- [4] 韦天富. 论广西狼兵在明代沿海抗倭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J]. 广西地方志,2010(5).
- [5] 明英宗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6] 明太祖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7] 明武宗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8] 采九德. 倭变事略[M]. 上海书店 1982.
- [9] 周清原. 西湖二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10] 王阳明集[M]. 浙江巡抚采进本.

[责任编辑 李兆平]